

教学参考丛书之一

1962
毕业论文选集

一九六三年

目 录

孔子体育思想初探·····	62級理論班	周西寬 (1)
指导教师	曠文楠	
談体操教学中的誘导練習·····	62級体操班	燕肇林 (18)
指导教师	謝显懋	
女子自由体操自选动作中舞蹈动作的编排·····		(31)
62級体操班	馮若蘭	
指导教师	秦时植	
对三級跳远摆动腿的技术分析·····	62級田徑班	龙鑫炎 (43)
指导教师	刘天仕	
边鋒的職責和条件·····	62級球类班	刘海池 (52)
指导教师	蔣朝貴	
跳停切入·····	62級球类班	罗玉華 (85)
指导教师	韓之棟	
論壘球“游擊”技术今后發展的趋向·····		(92)
62級球类班	鍾潤芳	
指导教师	夏德立	
“对八打”动作圖解·····	62級武术班	苟伯常 (99)
指导教师	藍素貞	
繪 圖	李光祿	
簡化太極拳技术形成初探·····	62級武 班	李德仁 (119)
指导教师	習云太	
女子經期中的体育訓練問題·····	62級体操班	張秀貞 (134)
指导教师	叶培基	

孔子体育思想初探

62級理論班 周西寬

指導教師 曠文楠

孔子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位教育家，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兩千多年來，他的思想和行為，對我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古今學者，對於孔子的研究是極其豐富的。但是，這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體育的關係如何呢？這却是一個很少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就好象孔子與體育根本無關一樣，我以為這不符合孔子教育的實際情況。因此，本文擬就孔子的體育思想，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同志，對這一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研究孔子的體育思想，有兩個主要難點：一是孔子及其學生沒有給我們留下系統的、直接的、有關體育的古籍資料，我們只能就一些有關的片斷史料進行分析、研究。二是對於孔子所處的時代和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在學術界中，至今未成定論；所以本文對這些方面，只能採用一種自己認為合理的觀點，即：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奴隸制迅速崩潰，而向封建制轉化的過渡時代；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張代表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孔子的立場是在新興地主階級這一邊；孔子的世界觀，有唯物主義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也有唯心主義的一面。上述這些，對於研究孔子的體育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

限於水平，本文對孔子體育思想所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中，不妥之處一定很多，敬希同志們，特別是前輩指教。

一 孔子教育中的体育因素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响亮地提出教育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人。《論語·为政》有这样一段：“或謂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他认为他的德化教育就是政治工作。可见，他的教育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即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他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所以他教育的实质，乃是培养能够实行他的“王道”或者“仁政”的人。

孔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是属于“士”阶层的“君子”。“君子”为何人？这在孔子就说得特别多。其中，大部分是说，“君子”要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质；不过，说得最典型最全面的要算这些话了：“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論語·宪問》）故《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可见，孔子的所谓“君子”，就是要具有“知、仁、勇”品德的人。这里，“知”，指智力的发展；“仁”，指孔子要求的根本道德；“勇”，指勇敢，无畏，有时也指毅力、果决等意志品质。为什么要具备“知、仁、勇”的品德呢？孔子说：“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这不是说得十分清楚么。只有以“知、仁、勇”三个方面修身，才能“治人”、“治天下国家”；对于孔子来讲，只有以此三个方面教育学生，才能造就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施行“仁政”的统治者。

孔子对于“君子”的“知、仁、勇”要求，实质上是他教育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知、仁、勇”教育，当然还不等于今日所说的“三育”；这是因为，“知、仁、勇”比“德、智、体”意义狭窄，而且，二者在本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孔子对

他的学生提出的“知、仁、勇”要求，仍然是比較全面的。这和今日的“三育”却有些类似。所以我們說，孔子的教育，固然是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但其比較全面的教育的思想则是可贵的。

特別需要指出，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已經有了体育的因素；因为勇敢、无畏、毅力等意志品質的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体育。誠然，意志品質在社会实践中，特別是在生产劳动中也能得到鍛煉，但对于孔子及其弟子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來說，通过体育来培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孔子教育中的体育因素，表现在他把“勇”作为对学生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还可以从他关于“聖人”，“成人”等論述中得到了了解：

“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临大难而不惧者，聖人之勇也。’”（《庄子·秋水》）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列子·仲尼》）

“子路問成人。子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

“聖人”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人物，在孔子看来，“聖人”也应该具有“勇”这种美德。卞庄子是魯國一个聞名的勇士，孔子竟以他为榜样。不难看出，孔子要求的“君子”，絕不是一些斯斯文文的文弱之士，而是博学多能，武勇蛮健的人。其教育思想中的体育因素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有的同志說，“勇”是一种品德，“勇”的培养，实际上就是德育，哪有什么“体育因素”呢？誠然，孔夫子是把“勇”归在“达德”範圍內的。但是，他既把“勇”与“知、仁”相提并論，就足見“勇”的教育有别于“知、仁”教育。即有别于智育

和德育，这是一点。另外，德育和体育本身有着十分緊密的联系，尤其是在孔子看来，不仅从事体育锻炼是在修德，而且从事艺术、娱乐等活动也是在修德。这个“德”真是无所不包。从这点来说，“勇”的教育当然也是德育。不过，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实在也是可以把“勇”的教育从德育中分出来“自立門戶”的，因为“勇”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身体锻炼来实现。这，怎么又不可以说，“勇”的教育具有体育的因素呢？

由于孔子教育思想中有体育因素，故在孔子的教育中，就有实际上是体育性质的内容。《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六艺”是什么呢？这从来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一说是“易、诗、书、礼、乐、春秋”（贾谊：《新书·六术篇》）。上述两种说法都各有所指，各有根据，不能说孰是孰非。不过，在我看来，两种“六艺”内容都可能是孔子教育的内容。

孔子是一个极其推崇西周文化，而自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吾从周”的教育家。故他的教育，主要还是对西周教育的继承。西周的统治阶级，为了把本阶级年轻的一代培养成为有文化，有威仪，有军事知识，技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也曾大力办过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二者实际上属于体育课程。因为它们具有体育的基本作用：“强筋骨”、“强意志”、“调感情”、“增知识”①；同时，它们也有体育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如象比赛，活动有一定规则、方法等等。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学文”或“游于艺”的教育，也就是指包括射、御在内的“六艺”教育②。所以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儒派学者颜习斋先生说：“预意孔子之立教，先以文，即礼、乐、射、御

等，宗周公之六艺也；次以行，即孝、友、睦、姻等，宗周公之六行也；終以忠、信，即智、仁、聖、義等，宗周公之六德也。”

（《四書正誤》卷三）這不但說明了孔子教育中有射、御內容，而且也說明了孔子教育對西周教育的繼承關係。

當然，孔子對西周教育並非只有繼承而無發展。他不僅豐富了教育內容，而且还加進了一種新的精神。他教育的最基本內容是“詩、書、禮、樂”，這些都是他對傳統文化整理、加工的成果。“易”和“春秋”相傳為孔子所著，孔子也固然少不了以這些東西傳授學生；不過因這些學問艱深難懂，想必不可能成為教育的基本內容。

需要指出：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比較可靠的《論語》一書，是少於談到射、御的，我想，其原因大概是射、御一般屬初級課程（這和西周一樣）。《論語》所載孔子學生，多是已學過射、御的成人學生（相當於西周的“大學生”），他們受孔子的教育，主要是在道德方面；學習的東西如前所述，是詩、書、禮、樂之類。所以，在他們的学生所編纂的《論語》一書中，就少於提到射、御之事。但是，這不等於說孔子教育中就沒有體育內容，正象今日一般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學生沒有體育課，而不能說大學教育沒有體育一樣。射和御，對於那些成人學生來說，雖不必是專門課程，但却是他們必修的知識、技能，這是由孔子的培养目标所決定了的，此其一。其二，在《論語》中，仍然可以直接、間接地找到一些有關射、御的言論。可以想見，射、御即令不是他們的專門課程，也是其課餘經常從事的一種禮儀或健身活動，這或許就是他們的一種“課外活動”吧。此點，在本文以下的論述中，更是顯而易見。

二 孔子體育的特點

第一，孔子的體育和他的禮、樂教育是緊密地配合着的。這

問題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簡略提到。孔子一生中最重視的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和體育有何關係呢？我們先看看孔子對“仁”、

“義”、和“勇”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解釋的：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

這一類的話，孔子說得很多。他把道德看作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出發點，他深深懂得，體育如果離開德育，社會上就會多出“亂”和“盜”來，這是不利於他政治理想的實現的。所以，孔子在體育中，特別強調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過禮、樂教育來實現，故他相當注意射、御和禮、樂的配合。看看他關於射箭的几則言論吧：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修》）

“何以射，何以听，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為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安能以求？”（《孔子家語·觀鄉射》）

這是說，君子的賢德，在於射必求中，爭取勝利。而在求勝過程中，又必須恪守禮制，恭敬讓，尊人自抑。你看，孔夫子在這一點上，同我們今天所提倡的運動員在運動中，既要力爭比賽勝利，又要嚴守運動規則和運動道德的精神是多麼相似啊！當然，我們提倡的道德和孔子所講的道德，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

在體育中，孔子還主張“射不主皮”（《論語·八修》）。他認為射箭不應單純以射中靶子為善，還應當使體態合於禮，動作節於樂。他把射箭看做修德的一個重要方面。故一個人的德行如何，往往從體育運動的射箭中就清楚地看得出來。

從孔子體育的第一個特點中，我們可以了解，體育自古以來就是和德育聯繫着的。在階級社會里，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

标准，体育和德育的配合，说明自社会出现阶级之后，体育从来就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东西，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因而是具有阶级性的。

在分析孔子体育的第一个特点时，也须指出，由于孔子最重视德育，故尔他往往多从德育的角度来强调体育。而对于体育本身的强身作用却很少谈到。这是和他把道德看做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唯心观点分不开的。

第二，孔子的体育和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特点，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体育的特点。古代体育项目的主流，很多都直接来源于军事（如武术）。因而体育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就特别密切。有的项目，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它属体育；从直接的军事目的来讲，它又是军事训练，而这二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军事训练往往以体育为手段，体育锻炼又多以掌握军事技能为内容（当然最终也达到军事目的）。所以，一个项目往往是“一身二任”。由于射箭和赶车是两种军事技能，所以射、御就是上述类型的体育项目。离开了军事训练去找古代体育的主流是找不到的。体育、军事一体的项目，和现代田径、体操等，有不同的地方，但和国防体育项目却颇类似。

孔子这位教育家是很重视军事训练的。他曾说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还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同上）他不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还懂军事知识。他虽然自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但这些话，是他在对卫灵公准备用军事有不满情绪时说出来的；他不愿意回答卫灵公向他关于军事问题的请教。实际上呢，孔子是懂军事的。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就是军事人材。如冉有，便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别人问他，军事才能是学到的还是生就的，他回答说，是从他的老师——孔子那里学来的③。可见，孔子还通晓军事。军事知识，技能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不学，故博学多能的孔子对他的学生，自然少不了军事训练。而这种训

練，無疑又是和體育結合着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說孔子的射，御屬於體育，而不把它們叫軍事訓練呢？這是因為，孔子及其學生主要還是一些“文士”，他們從事射，御的直接目的是強身，修德，而不是作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射，御本身的若干練習（“五射”、“五御”）中，直接用於作戰的練習極少，更多的却是為了生活的實用和作為修德的手段。所以我們說，射，御實際上是孔子的體育內容，雖然從事這些活動，最後也能達到軍事的目的。這種體育項目，和武術是很相似的。

第三，在孔子的體育中，相當重視衛生保健。孔子十分懂得，體育和衛生保健的目的，從根本上說來是一致的，即增進人體健康。故孔子除了愛好運動外，還相當講究衛生。這一點我們僅從《論語·鄉黨》篇中的若干記載就可以清楚知道。

他吃的食物，是要經常變更的，這從“齊（齋）必變食”可得而知。經久腐爛了的，變色變味的食物或魚肉他不吃——“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割不正，不食”④。他還不吃生冷的東西——“失飪，不食”。不食過量的肉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飲酒雖然“無量”，但也不致鬧到亂禮的程度——“惟酒無量，不及亂”。不過，釀得不好的酒，所謂“沽酒”，他是不喝的。⑤市上賣的干肉條，即所謂“市脯”，他怕骯髒也是不吃的。他很講究定食定量：“不時，不食”，“不多食”。在吃飯的時候，他不愛講話：“食不語”。除了在飲食方面講究外，對於睡眠衛生，他也絲毫不忽視：“寢不言”——睡覺的時候不說話；“寢不尸”——喜側臥而不愛仰臥。

以上這些，用今天的科學觀點來衡量，也仍然是良好的衛生習慣。因此，《體育之研究》一文的作者說：“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這說明了孔子是把衛生保健和體育密切配合着來養生

的。

不过，同样須指出，由于孔子一切言行都遵循着礼制，故他在饮食起居方面的讲究，也往往是从礼的角度出发。礼，规范着他的体育，也规范着他的卫生习惯。而礼又是德育的主要内容。因此之故，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之最重视德育，而否認其体育思想，卫生习惯。否则，我們就会得出孔子只讲德育的結論，这无疑是不正确的，它无助于我們对孔子的全面了解。

三 孔子的体育实践

孔夫子爱好多种多样的健身活动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这在古笈中有直接、間接的零星記載。

射和御，是孔子最勤奋学习，最擅长的运动。他說：“吾十五而志于学”（《論語·述而》）。这个“学”中就包括有射和御：“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論語·子罕》）这个博学的“学”，就是指的技艺之学，其中也包括了射、御。

《孔子家語·观乡射》記有孔子和他的学生习射之事：“与門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牆焉。”可見，孔子射箭的技艺是很高超的，不然，哪会吸引那么多的观众？

《論語·述而》云：孔子“弋不射宿。”弋是系矢的弓箭；“宿”，指栖巢之鳥。这里固然是以孔子不射栖息之鳥，来表明他賢德到了“恩及禽兽”的地步，但也显露出孔子是很爱射箭的，只是不射宿鳥而已。古时候，弋是用来射杀飛鳥的。既言孔子“弋不射宿”，那嗎，我們可以想見，飛鳥大概不在孔子“不射”之列了。

古代，射和御是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兩行技艺。不論战争，或是田獵，御車技术之好坏，直接影响射之得失。所以，习射必习御。

孔子的御技，也相当高明。“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夫子听到这句话后你猜怎么回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論語·子罕》）

注意，这里孔子說的“謙虛話”。因为御在“六艺”中为最容易学的技艺。当别人夸他博学多能，但惜不能成一名的时候，他只承認自己不过专会赶车而已。但正因为是謙言，而道“吾执御矣”，就更足以証明孔子御技之精良了。須得說一声，御在“六艺”中虽为最易之，但即比今日赶马车的技，复難得多。元人舒天民說：“御者之职，一车四马，四马八轡，两轡納轡，六轡在手，欲其調習，不失其驰。”（《六艺綱目·五御》）可見，执御的人必須善于以六根韁繩控制四匹馬，或急或緩，須得心应手。同时，那时在御中，按技艺之高下和实用范围又分为五类：“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和“逐禽左”，即所謂“五御”。其实用广，技术却并不簡單。孔子既精于御，足見他習御所下功夫之大了。

射，御是孔子体育的内容，因而在孔子的学生中，有很多都会赶车。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常常是他們作车夫。这从《論語》“子适卫，冉有仆”（《子路》）、“樊遲御”（《为政》）的記載和《史記·孔子世家》“將适陈，顏刻仆”的記載，便可以得知。

除射、御外，孔子还好打獵。古时候，打獵叫做田獵，是一种重要的礼仪。上自天子、諸侯、士、大夫等统治者，下至庶民百姓，都常举行这一仪式。在魯国，人們圍囿，追杀禽兽，互相爭夺禽兽，得之以作祭祀的活动，則是一重要的、特殊的風俗。孔子在魯国做大官的时候，非但不違民俗，而且还投入爭夺禽兽的活动中去。故孟子道：“孔子仕于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万章下》）这虽表现了孔子从俗“与民同乐”，但也反映出他确实爱好打獵。这大概是他具有精良的射箭技术

分不开的吧。

此外，釣魚、登山、野游等，也是孔子所喜好的活動。

《論語·述而》云：“子釣而不網。”這是說，孔夫子愛垂釣，而不喜歡用多鉤的大“網”攔流捕魚。

《孟子·尽心》章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這也雖是個譬喻，意思是說，一個人眼界狹窄，志氣就小，視野廣闊，志氣就大；但這個譬喻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據有關學者考究，“東山”或許就是蒙山，因山小，後失其名。它和泰山都在魯國境內^⑥。所以，孔子“登東山”、“登泰山”蓋確有其事，可惜詳情不得而知。

關於孔子野游之事，古書中不見直接記載。不過在《淮南子·人間篇》中有“孔子行（游）于東野”這樣的記事。這種野游和今天人們所愛好的旅行活動是差不了多遠的。

孔子善于以各種健身活動養生，也善于以文化娛樂的方式休息。他一生中都在酷愛着音樂：彈琴鼓瑟，能歌好舞。這一類的記載是非常之多的。“樂”雖是孔子的修德之業，實在也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娛樂活動。而舞，特別是“武舞”，那更是直接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了。

總之，孔子是善于養生的。他能有“學而不倦，誨人不厭”的充沛的精力，能成為“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⑦的人，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甚至如“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⑧的說法，及“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羊，就之如鼎，望之如斗”^⑨的誇張，也不是一點兒根據都沒有的呢！

四 孔子體育的成就和意義

孔子體育的成就，是他整個教育成就的一部分。如前所述，他教育的目標，是造成士階層的“君子”。孔子一生中，的確培

养了不少“君子”，他们在“知、仁、勇”三个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里，要着重谈一谈的是，孔子及其所培养的许多“君子”，都是些体魄蛮健的武勇之士。这就是孔子体育成就的具体表现。

让我们先看看孔子本人吧。孔子是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他实际上就是个典型的“士君子”。他在德、智方面超过常人，这勿庸置疑；而在“勇”这一方面如何呢？

《墨子·非儒》载：“孔丘为鲁司寇，舍（捨）公室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抉）植。”

这事发生在孔子五十多岁做鲁国大官的时候。孔子站在大贵族季孙氏和同王鲁定公方面，同其他几家大贵族作政治上的争斗。因城门掩上，挡住了季孙氏的迷路，孔子则替他把城门挺开了⑩。

此事在其他古策中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慎大篇》：“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列子·说符》篇：

“孔子能招国门之关。”《淮南子·主训》篇：孔子“智过于长弘，勇服于孟贲，足躡郊豕，力招城关。”同书《应道训》：

“孔子劲拘国门之关。”

这几段文字中的“举”、“招”、“拘”三字是一个意思，都谓孔子把城门关举起来。这充分证明了孔子是一位武勇过人的大力士。

孔子的“勇”，还表现在他不畏强敌，在政治上、礼制上不作让步这些方面。他在鲁国做大官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强大的齐国，害怕鲁国逐渐强大，就与之在夹谷这地方举行会盟；目的在于阴谋劫持鲁君，以使鲁国屈服。但由于负责外交的孔子早识破了敌人的这一圈套，遂事先作了武备；并在会盟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了齐国的种种阴谋举动，致使齐国惧怕，阴谋终未得逞，并且还被迫归还了原来所侵占的鲁国郚、灌、汶阳和龟阴等地，以示向鲁国谢过。⑪

清人梁启超曾就这件事感慨地说：“天下之大勇，孰有过于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于斯！”⑫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大难临头也是不害怕的。“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庄子·秋水》）“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些，充分表现了孔老夫子的勇敢与镇静。

有这么一个勇健的老师，又会有怎么样的学生呢？古史资料告诉我们，孔子学生中，也有很多著名的武勇者，如象子路、冉有、公良孺、子张、漆雕开等等。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配緌豚……”这显然是个武士的形象。《吕氏春秋·察微》载：“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可见，子路是个见义勇为的好汉子。子路在卫国作大夫孔悝的邑宰时，扶持孔悝，同卫庄公蒯聩作斗争，在危难中，子路并不害怕，还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仲尼弟子列传》）临死之时，勇气也丝毫不减：“石乞，壶廪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纓而死。”（同上）难怪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啊！

冉有是一位有军事才能的武将。鲁哀公十一年，吴国联合鲁国攻打齐国，不料齐军侵入了鲁国。此时，鲁国三家最有势力的贵族，都不肯出兵抵抗。经过冉有一一劝说之后，始得出兵。但有兩家贵族的兵都接连吃了败仗；惟有冉有所率领的季氏这支兵打了胜仗，并因此而立了大功。⑬这个故事，说明了冉有是个非凡的武士。

孔子有位叫公良孺的学生，“其为人长，贤有勇力”，他随同孔子周游列国，在去陈过卫的途中，遭到蒲城这个地方的人的包围，不让他们经过蒲地。在危难中，公良孺道：“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说罢，便带头勇猛地同蒲人战斗起来。这下，蒲人害怕了，只好答应让他们离开蒲城。这是太史公记载于《孔子世家》中的一个故事。这里不是把公良孺的勇猛精神表现得十分突出吗？

《艺文类聚》引《庄子》佚文曰：“子张为武”，可知子张也是个武人。《韩非子·显学篇》曰：“漆雕之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则遽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这把漆雕开那付矜气尚勇的形象是刻画得相当明晰的。

此外，在孔子的学生中，诸如阳货、子贡、佛佺等许多人，也都是些多少带有任侠气味的勇敢之士。

孔子及其学生的武勇精神之所以形成，乃是和孔子的体育分不开的。这是他体育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不论对孔子所处的时代，或是对孔子以后的时代，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的体育，也因此具有巨大意义：

首先，孔门的大批武勇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春秋各国旧奴隶主阶级的腐朽力量，这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代里，有一定进步作用。所谓“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心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和“子贡，季路辅孔惶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佺以中牟叛，漆雕刑（形）残”^①等儒家反对派的这些非难，实际上正好说明孔门是支持比较开明的新兴势力，反对腐朽的旧势力的。要不，子路就不会落到死后连尸首也被煮成肉酱的地步，漆雕开也不会遭到“刑残”。孔子及其弟子支持“乱党”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从这里，我们不难了解，孔子虽然反对“天下无道”，但他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的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倾轧，而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斗争，他则是支持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一生中

始終不能施展其抱負的根本原因。不過，也得指出，因為孔子畢竟是個改良主義者，故他的反叛行為是有限度的。他不能徹底做到“勸下亂上”而推翻舊的制度，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身上，實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施予人們一些好處；而廣大人民呢，則無論如何是不應“犯上作亂”的。這是孔子的剝削階級立場所固有的局限性。

其次，孔子的體育，對我國長期封建社會的教育有着極大影響；孔門的武勇精神，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良好典範。歷代的封建統治階級，由於害怕人民群众的武力反抗，故差不多都提倡重文輕武。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就驟然登上了“聖人”的寶座。封建制度的完全確立，需要新的與之適應的意識形態，封建統治者找到了作為封建意識形態“開山祖師”的孔老夫子，那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所崇尚的“孔聖人”，却不是孔子的本來面目；因為這個被粉飾了的“聖人”已成了文明柔順、斯斯文文、弱不禁風的典型了。這是封建統治者對孔子的一種莫大的歪曲；其目的在於使人們向這位“大聖先師”學習，以便都成為他們所需要的、沒有一點兒反抗能力的“順民”。然而，每個時代，總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不曾受統治階級的這種欺騙的蒙蔽。他們真正了解孔子，並效法孔子，提倡文武並重，以“知、仁、勇”三個方面鞭策自己。且不說較遠的朝代，就以較近的幾個朝代來說吧，如宋代的文天祥、岳飛，明代的王陽明，明末清初的顏習齋，清代的李恕谷、顧炎武等等人物，就是重文又重武的民族英雄、教育家、思想家。特別是顏習齋，他甚至主張習孔子的“六藝”，以其中的射、御作體育內容。這就十分清楚的看出，孔子體育對後世影響之大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在中國漫長的、輕視體育的封建教育中，還有一點體育因素的話，這是和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廣影響分不開的。

最後，還必須指出，孔子的體育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孔子把體育列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思想值得好好